

# 科举视域下《大学》的经义阐释与权力话语 ——以明清程朱理学正统性为中心

王泽翰<sup>1</sup>, 牛昊原<sup>1, 2</sup>

1. 曲阜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 山东 曲阜 273165

2. 烟台黄渤海新区牟城中学, 山东 烟台 264100

DOI:10.61369/HASS.2025080011

**摘要：** 明清科举制度与程朱理学深度融合，共同构筑了国家意识形态的基石。本文聚焦于“四书”核心《大学》，探讨科举如何作为一种规训机制，将其诠释权收归于程朱注疏，从而构建服务于皇权秩序的权力话语。文章通过梳理明代《四书大全》与清代“尊朱”政策，揭示制度如何确立程朱理学的阐释霸权；进而分析科举考题与八股文如何将理学思辨转化为程式化的知识生产，塑造士人思维；最后借由对异质阐释的排斥，反观该话语体系的排他性。本文认为，科举制度下的《大学》阐释，实为国家权力主导、旨在统一思想的文化实践，深刻反映了知识、权力与政治正统性之间的共生关系。

**关键词：** 科举；《大学》；程朱理学；权力话语；经义阐释；明清经学

##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Classics and Power Discourse of "The Great Learni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System: Centered on the Orthodontic Nature of Cheng-Zhu Neo-Confucianism in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Wang Zehan<sup>1</sup>, Niu Haoyuan<sup>1, 2</sup>

1. School of History and Culture, Qufu Normal University, Qufu, Shandong 273165

2. Mucheng Middle School, Huangbohai New Area, Yantai, Shandong 264100

**Abstract：**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system of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was deeply integrated with Cheng-Zhu Neo-Confucianism, jointly building the cornerstone of the national ideology. This article focuses on the core of the "Four Books", the "Great Learning", and explores how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system, as a disciplinary mechanism, centralized its interpretive power under the commentaries of Cheng and Zhu, thereby constructing a power discourse that served the imperial order. This article reveals how the system established the interpretive hegemony of Cheng-Zhu Neo-Confucianism by sorting out the "Complete Collection of the Four Books" of the Ming Dynasty and the "Respect for Zhu" policy of the Qing Dynasty. Furthermore, analyze how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questions and the eight-legged essay transformed the theoretical thinking of Neo-Confucianism into stylized knowledge production and shaped the thinking of scholars. Finally, by rejecting heterogeneous interpretations, we reflect on the exclusivity of this discourse system. This article holds that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Great Learning" under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system is actually a cultural practice dominated by state power and aimed at unifying thoughts, profoundly reflecting the symbiotic relationship among knowledge, power and political legitimacy.

**Keywords：** imperial examination; "Great Learning "; Cheng-Zhu Neo-Confucianism; discourse of power; interpretation of the literal meaning; confucian classics of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 引言：问题缘起与分析框架

《大学》自宋代理学家二程、朱熹竭力表彰，被从《礼记》中抽出并列为“四书”之首后，其地位日益隆升。朱熹认为《大学》是“为学纲目”，“修身治人”的规模法度皆在于此<sup>[1]</sup>。至明清两代，随着科举制度走向极盛，并以《四书章句集注》为绝对准绳，《大学》更成为天下士子求学致仕的入门阶梯与思想圭臬。学术界对明清科举制度与程朱理学已有丰硕研究，或侧重于制度沿革，或聚焦于哲学

流变，但将科举本身视为一种主动的、建构性的“权力话语”（Discourse of Power）机制，用以分析其对《大学》这一核心经典的阐释所进行的系统性规训，仍有深入探讨的空间。

文章借鉴米歇尔·福柯的知识权力理论，把科举制度视为一个生产“真理”和“知识”的装置<sup>[10]</sup>。它并非被动地反映思想，反而是主动地塑造、界定和排斥思想，进而生产出符合统治需要的主体。在这一视角下，明清科举通过对文体格式、考试内容、阐释标准的严格规定，成功构建了以程朱理学为唯一正统的《大学》阐释体系。这一体系不仅是一种选拔机制，更是一种强大的文化权力实践，其目的在于确保意识形态的统一，从而维护政治社会的稳定。

据此，本文的核心论点是：明清科举通过制度性建构、话语性实践和排他性边界三个层面，将《大学》的经义阐释牢牢束缚于程朱理学的框架内，使其成为再生产皇权意识形态和士大夫忠诚主体的关键工具。下文将依次从制度构建、话语实践与张力回应三个方面展开论证，以期揭示科举、经学与权力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

## 一、制度构建：科举规范与《大学》阐释的“钦定”化

### （一）明代《四书大全》的颁布与程朱正统的官学化

明太祖朱元璋开国之初，即定下“一宗朱氏之学，令学者非五经、孔孟之书不读，非濂、洛、关、闽之学不讲”的基调<sup>[4]</sup>。至明成祖永乐年间，这一政策达到顶峰。永乐十二年（1414年），成祖敕令翰林院学士胡广、杨荣等纂修《五经大全》《四书大全》《性理大全》，其目的非常明确：“使天下之人，获睹经书之全，探见圣贤之学……修之于身，行之于家，用之于国，而达之于天下也。”<sup>[4]</sup>

其中，《四书大全》的编纂尤为关键。它虽以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为宗<sup>[1]</sup>，“博采诸家之说”，但其编纂实质是“集一家之言”，即将所有对《四书》的阐释都统合到朱学的旗帜下，并赋予其官方法定地位。顾炎武在《日知录》中尖锐地批评道：“当日儒臣，奉旨修《四书五经大全》，……仅取已成之书，抄誊一过，上欺朝廷，下逛士子”“《大全》出而经说亡”<sup>[5]</sup>。顾氏之论虽有过度之处，却深刻揭示了《大全》颁布所带来的决定性影响：它并非促进学术繁荣，而是通过官方的“钦定”行为，终结了经学阐释的多元可能性，确立了程朱理学不可动摇的“话语霸权”。

从此，科举考试“但许遵依《传》《注》，立论鬻依《大全》”<sup>[4]</sup>。士子答题，意有不同即遭黜落。这意味着，对《大学》中任何概念的理解，如“明明德”“亲民”“格物致知”等，都必须严格遵循朱子的界定<sup>[1]</sup>。例如，关于“亲民”二字，朱熹秉承二程之意，释为“新民”，认为当作“革新民众”解。尽管历史上仍有学者（如王阳明）主张回归“亲民”（亲爱民众）的古义<sup>[2]</sup>，但在科举场域中，唯有“新民”才是唯一正确的“真理”。制度的力量将一种学术观点固化为不容置疑的政治信条。

### （二）清代的“尊朱”国策与科学考试的精细化规制

清朝以异族入主中原，为确立其政治合法性，在文化上全盘继承并强化了明代的程朱理学正统。康熙皇帝尊奉朱熹为“集大成而继千百年绝传之学，开愚蒙而立亿万世一定之归”，将其抬入孔庙大成殿配享，其地位仅次于孔孟<sup>[6]</sup>。乾隆皇帝虽学术趣味广泛，但在科举取士这一根本大法上，则坚决维护朱学正统。

相较于明代，清代的科举规制更为严密和精细化。《钦定科场条例》对考试程序、文体格式、避讳事项乃至书写规范都有近乎苛细的规定<sup>[5]</sup>。这种精细化的管理，是权力技术臻于成熟的体

现，其目的在于将知识生产和思想表达控制在最小误差范围内。对于《大学》的阐释，清代科举不仅要求内容上遵循朱注<sup>[1]</sup>，甚至在行文语气、引证范围上都有不成文的规矩。例如，在阐发“格物致知”时，必须紧扣朱子“即物穷理”的渐进认识论，强调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的积累功夫，任何偏向禅宗“顿悟”或阳明心学“直指本心”的表述<sup>[2]</sup>，都会被视为“异端邪说”而受到严惩。

这种制度性的建构，使得程朱理学对《大学》的阐释不再是可供讨论的学术观点，而是士人进入权力阶层的唯一“通行证”。朝廷通过科举这一制度装置，成功地垄断了《大学》的诠释权，并将其转化为维护自身统治合法性的权力话语。

## 二、话语实践：科举场域中的《大学》经义运作

### （一）考题导向：以“朱注”为圭臬的阐释边界

科举考试的具体题目，是权力话语运作最直接的体现。从现存的明清乡试、会试考题来看，涉及《大学》的题目多围绕其核心概念展开，如“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三纲领），或“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致知在格物”（八条目）等<sup>[1]</sup>。

这些题目本身即预设了答题的框架和边界。例如，一道以“致知在格物”为题的考题，其标准答案必然指向朱熹的《补传》：“所谓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穷其理也。”<sup>[1]</sup>士子需要阐发“即物穷理”的微言大义，论述如何通过接触事物来探究其内在之理，从而达到内心之知的扩充。如果士子在此引入王阳明对“格物”的解释（如“格者，正也，正其不正以归于正”）<sup>[2]</sup>，即使用理透彻、文采斐然，也注定名落孙山。考题 thus 成为一道隐形的围墙，将阐释牢牢锁定在钦定的范围之内。

### （二）文体规训：八股文格式对《大学》义理的“结构化”呈现

如果说考题划定了内容边界，那么八股文则从形式上完成了对思想的规训。八股文又称“制义”，是一种有固定格式的议论文体，要求由“破题、承题、起讲、入手、起股、中股、后股、束股”等部分构成，其中核心部分必须用对偶的段落（股）进行论述<sup>[8]</sup>。

八股文的高度程式化，深刻规训着《大学》义理的阐释路径。其一，它要求写作者将《大学》中圆融的思想脉络拆解为若干孤立的论点，再以严格对仗的句式进行铺陈演绎。例如，在阐

发“修身”与“齐家”之关联时，士人必须在“起股”中作正面申述，继而在“中股”中从反面加以论证，由此构建一种机械对称的论述结构。这一过程虽在某种程度上强化了形式逻辑，实则将活泼的哲学思辨囚禁于僵化的形式枷锁之中。

其二，八股文讲究“代圣贤立言”，写作者需隐匿个人见解，完全模拟孔子、朱子等圣贤的口吻进行论述。此种写作范式，迫使士人长期浸淫于程朱理学的话语体系，并在反复操练中，不自觉地这套话语内化为自身的认知框架。正如商衍鎤在《清代科举考试述录》中所指出的，上乘八股文贵在“清真雅正”——内容须纯粹恪守朱注，文风务求典雅，形式力求工稳<sup>[6]</sup>。在此标准下，思想的原创性让位于格式的完美与阐释的“正确”。通过八股文，权力不仅界定了思想的边界（“说什么”），更从根本上规定了表达的范式（“怎么说”），从而完成了对士人思维最深层的塑造。

### （三）知识生产：程朱理学话语通过科举向士人群体的渗透

科举制度建构了一套贯通基础启蒙与高级铨选的完整知识生产体系。自童蒙初启，学子便需濡习《大学章句》<sup>[1]</sup>；至书院讲席，师生所务亦不离揣摩朱注、研习八股。这一教育体系的根本指向，始终围绕着科举考试的成功展开<sup>[8]</sup>。

在此体系下，程朱理学对《大学》的特定诠释，通过蒙学教材、塾师讲授、科场范文（如“程墨”“房稿”）等多种渠道被持续再生产，深刻浸润着每一位士子的知识构架与思维方式<sup>[9]</sup>。其人生观与价值取向，亦在此过程中被重新塑造。最终得以跻身仕途者，不仅成为这一话语体系培育出的“合格产物”，更化身为其最坚定的传承者与捍卫者。当他们步入官僚体系，便会自然而然地运用这套思维模式进行决策与施政，从而在制度实践中确保了帝国意识形态的纵向贯通与横向延续。科举制度由此实现了权力话语的社会化再生产，将文化权力稳固转化为政治秩序的内在支撑。

## 三、张力与回应：权力话语下的异声及其边缘化

任何权力话语的确立，都伴随着对异质声音的压制和排斥。明清时期，对程朱理学《大学》观的挑战始终存在，但这些挑战在强大的科举制度面前，大多被边缘化。

### （一）心学对《大学古本》的推崇与科举主流的张力

明中叶以降，王阳明构建的心学体系对程朱正统形成深刻挑战。在《大学》诠释方面，阳明力主回归古本原典，质疑朱熹分章补传的正当性<sup>[2]</sup>。他认为《大学》本义原属“简易明白”，朱子的补传与分章反而使经文支离破碎。在其“致良知”学说框架下，“格物”被阐释为“正其不正以归于正”的工夫，强调“格物之功，只在心身上做”<sup>[3]</sup>。这种注重内向反省、直指本心的诠释路径，与朱熹主张的外向穷理之学形成根本分歧<sup>[1]</sup>。

## 参考文献

[1] 朱熹. 四书章句集注 [M]. 北京：中华书局，2012.

[2] 王阳明. 王阳明全集 [M]. 吴光，等，编校.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3] 顾炎武. 日知录集释 [M]. 黄汝成，集释.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4] 张廷玉，等. 明史 [M]. 北京：中华书局，1974.

[5] 昆冈，等. 钦定大清会典事例 [Z]. 光绪年间石印本.

[6] 商衍鎤. 清代科举考试述录 [M].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8.

[7] 余英时. 朱熹的历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 [M].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

[8] 陈宝良. 明代儒学生员与地方社会 [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

[9] [美] 艾尔曼 (Benjamin A. Elman). 从理学到朴学：中华帝国晚期思想与社会变化面面观 [M]. 赵刚，译.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

[10] [法] 米歇尔·福柯 (Michel Foucault). 知识考古学 [M]. 谢强，马月，译.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

尽管阳明心学在明代中后期士人群中蔚为风潮，形成颇具影响力的学术流派，却在科举这一官方体制内始终难以动摇程朱学说的正统地位。熟谙心学典籍的应试者，若欲在科场中脱颖而出，不得不将个人对心学的认同隐藏起来，严格依照朱注的规范作答。这一现象清晰表明：科举制度作为一道坚固的制度性壁垒，成功地将学术领域的异质思想阻隔于权力核心之外，从而确保了主流意识形态的纯粹与稳定<sup>[7]</sup>。

### （二）明清之际的考据学挑战及其在科举体系中的有限空间

明末清初，一批学者在反思明亡的教训中，将矛头指向空疏的心学和僵化的八股取士制度。以陈确、毛奇龄等为代表的考据学家，开始从文本考辨的角度对《大学》本身提出质疑。陈确撰《大学辨》，力证《大学》非孔子所作、亦非曾子所传，而是秦汉以后的著作，其目的是从根本上解构程朱理学立于其上的经典权威<sup>[9]</sup>。

这种考据学挑战在学术史上具有革命性意义，但它对科举实践的影响微乎其微。无论学者在书斋中如何考证辩驳，《大学》在科举中的神圣地位丝毫未动。清代科举依然严格遵循朱注《大学章句》<sup>[1]、[5]</sup>。考据学的成果主要在以“汉学”为旗帜的学者圈子中流传，与绝大多数以科举为业的士人无关<sup>[9]</sup>。这再次证明，科举制度所维护的权力话语具有极强的排他性和封闭性，学术上的新发现若与其核心利益相冲突，便会被系统地忽视和排斥<sup>[10]</sup>。

## 四、结论：作为文化权力的科举

明清科举制度本质上是一套精密的文化权力装置<sup>[10]</sup>。它远非中立的选官渠道，而是通过将程朱理学奉为唯一正统，系统地规训了士人对《大学》的阐释，从而构建起一个服务于皇权秩序的话语体系。

这一体系的运作逻辑清晰可辨：制度层面，借由《四书大全》的钦定<sup>[3]、[4]</sup>与科场条例的精细化<sup>[5]</sup>，确立了程朱注疏的绝对权威<sup>[1]</sup>；实践层面，通过命题导向与八股文的严格格式<sup>[6]</sup>，将深刻的哲学思辨转化为标准化的知识生产，进而塑造士人的思维模式；边界层面，则通过排斥与边缘化心学<sup>[2]</sup>、考据学<sup>[9]</sup>等异质阐释，确保了话语体系的排他性与纯洁性。

最终，科举实现了知识、权力与政治的高度统一<sup>[7]、[10]</sup>。《大学》中“修齐治平”的崇高理想，在科举话语的长期浸染下，被转化为对现存政治秩序的无条件认同与维护。士人“学而优则仕”的上升路径，也因此成为一套将个体纳入帝国统治结构的规训程序<sup>[8]、[10]</sup>。剖析科举对《大学》的阐释，不仅关乎学术与制度史，更为了解传统中国如何通过文化权力维系其超稳定结构，提供了一把关键钥匙。这一围绕《大学》建立的话语体系，直至清末科举废除方告瓦解，然其深远的历史回响，至今仍值得警醒与深思。